

# 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

尹继武

**内容提要** 在联盟形成过程中,联盟信任是何时以及如何形成的?盟友间的信任是理性选择的产物,还是一种情感与态度需求?现有联盟政治理论并没有系统研究这些问题。本文从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出发,综合既有的国际关系联盟形成理论和信任研究,建构了两种联盟信任形成的解释模式——弱式理性主义模式和社会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以北约的形成作为案例,对理性主义和社会认知解释模式进行了说明。本文指出,在联盟情绪即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中,理性行为与认知因素均能产生情绪,两种解释各有所长,可相互补充。北约不仅是一种战略联盟,更承载了跨大西洋安全与道德共同体的身份。

**关键词** 联盟信任 北约 理性主义 情绪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国际关系中却没有成熟的信任理论。信任概念构成了诸多主流国际关系概念的基础,比如联盟、和谐、安全困境和声誉等。由于关于信任的研究尚不成熟,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联盟形成中的信

《国际政治科学》2008/4(总第16期),第35—78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任问题并未提供十分有效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架构。尤其是,现有的联盟形成理论很难说提出了针对信任形成进行研究这一十分重要的学术命题,更遑论提供系统的学理解释。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对如下问题做出回答:联盟形成过程中,联盟信任是何时以及如何形成的?盟友间的信任可信吗?联盟信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产物,还是一种情感与态度需求?

考虑到联盟信任的重要意义——信任是联盟形成、管理与崩溃的微观基础,笔者将从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出发,综合既有的国际关系联盟形成理论和信任研究,建构两种联盟信任形成的解释模式:弱式理性主义和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框架。在建构两种解释模式后,本文将运用北约形成的基本史实对上述两种联盟信任解释模式加以说明。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笔者对两种模式的解释力进行初步的总结。

### 一、联盟信任生成机制的弱式理性主义解释

由于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尚无系统的联盟信任形成理论,笔者先从理性假定出发,建构一种理性主义联盟信任形成假说;继而,从有限理性假定出发,建构一种社会认知的联盟信任形成假说。本文对联盟信任形成的理性主义解释立足于理性假定,分析理性、有限理性与联盟信任形成之间的相关关系,亦即弱式理性主义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假定国家行为是理性的,但国家的理性又是有限的。具体来说,国家联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国家知道自己的联盟

---

对联盟形成理论与国际关系信任研究的评述,请参阅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信任形成研究:一项基本评估》,《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第105—113页。理性主义者一般将信任定义为“对方倾向于相互合作而不是从利益的角度利用自己的合作信念”,见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笔者对信任的概念的界定和分类与此不同,具体请参阅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55—61页。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那里,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国家间信任难以确立。但是,我们似乎很难确定,到底交易成本减少到何种程度国家间的信任才得以形成。分析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升降,是解释联盟信任形成的一种方式,但它不能具体确定联盟信任何时形成。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运用于国际关系分析的著作,请参阅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Katja Weber, “Hierarchy amidst Anarchy: A Transaction Cost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2, 1997, pp. 321—340;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偏好及其优先顺序。所以,联盟信任是一种建立于“战略联盟”基础上的“商品”,是盟友之间理性计算的结果与产物。

在演绎理性主义解释时,我们可借鉴交易成本学说、社会交换理论以及威胁知觉论三种理论。从交易成本学说来说,如果联盟形成中交易成本越低,则越倾向于形成情绪性的信任,联盟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也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任务就在于分析交易成本与信任形成之间的关系,因而这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把信任视为联盟盟友之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由此可建立起社会交换的具体“数量”(如交易频率、人员往来以及对外援助等因素)与信任形成的关系。我们假设社会交换的“数量”与信任的形成为相关关系,则盟友之间对外援助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情绪性的信任。而从威胁知觉论来看,相关决策者威胁知觉大小与联盟形成具有内在联系。如果联盟形成过程中威胁知觉程度越高,表明联盟的动机为战略性的认知反应,联盟成为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即外在威胁维系和增强了群体认同。所以,如果威胁知觉程度越高,那么联盟信任不仅仅是认知性的,更有可能产生更高层次的群体认同,也更倾向于产生情绪性的信任。

在制度形式选择的分析模型中,田野把交易成本区分为缔约成本和治理成本两种类型,并提出了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等影响交易成本的六个因素与国家制度形式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笔者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家同质性和不确定性这两个变量上。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变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其他影响变量(比如问题领域敏感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等)对于分析联盟形成及联盟信任形成时的区分度不大;其二,国家同质性和不确定性两个变量分别对应单位国家属性与结构环境分析层次,由此,我们可以从单位和体系层次的理性变量出发,分析它们与信任形成、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在弱式理性主义解释框架中,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国家同质性、不确定性、社会交换程度和共有威胁知觉。

---

帕萨·达斯古普塔:《作为商品的信任》,载于郑也夫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杨玉明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8页。

Oliver E. Williamson,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6, No. 1, 1993, pp. 453—486.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第61—175页。

### (一) 国家同质性

国家同质性是指相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价值等多方面单位属性的相似程度。“国家同质性表明的是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法律体系、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等方面的一致性 or 相似性程度。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条件下,缔约国在某个方面的一致性 or 相似性程度越高,国家间缔约成本也就越低,国家间合作也就越容易达成。”国家属性的一致性程度与合作的形成紧密相关,这是因为,如果国家间同质性越高,国家间的信任就越容易达成。在联盟形成时,相关缔约国国家同质性越高,国家群体间的积极情绪就越容易产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在相关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缔约国之间同质性越高就越可能形成情绪性信任。

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等学者通过比较历史上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发现,价值观念的包容性是一种多元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核心条件与充分条件之一。他们总结认为,种族、语言上的差异往往导致政治共同体的瓦解。多元安全共同体的维系在于一种认同,一种基于“我们的”情感联系,从而使得国家同质性成为共同体内部信任形成的核心要素。对此,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也认为,国家同质性是集体身份形成的三个重要因素之一。所谓集体身份,其核心是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即一种“我们的”内群体身份的形成。换言之,同质性有助于情绪性信任的形成。

国家同质性可以由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多个角度的指标来体现。为了简化指标以便于分析,我们将政治模式、文化价值的相似程度作为比较联盟缔约国同质性程度的两个指标。这是因为,安全领域的联盟需求与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紧密相连。在西欧国际关系史上,曾出现很多宗教价值观念相似的军事政治联盟。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也将文明同质性作为

---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93页。

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23—133.

如果将同质性看作理性变量,那么我们是以前者的身份考察相关缔约国的同质性大小;如果以当事者——联盟缔约国的身份来观察同质性大小,那么不同成员国对于同质性的信念存在分歧。如A国认为与B国的同质性很高,但B国不一定就认同A国的同质性。这是联盟信任的非对称性来源之一。

不同群体的边界以及冲突的来源之一。反之,相关缔约国单位属性的同质性程度越高,所形成联盟的信任程度就越高,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吸引、认同也就越高,从而就越有可能形成情绪性的信任。

但是,缔约国的同质性程度与联盟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因果关系。比如,阿拉伯地区建立在高度文化、宗教相似性基础上的联盟往往是一种临时战略联盟。缔约国一定程度的国家同质性是联盟情绪性信任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缔约国同质性相差太大,则很难形成情绪性的信任,更多的是战略性或工具性的信任。一般而言,相关国家同质性程度越高,在特定联盟形成与选择时,缔结联盟的可能性就越高。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相似性的功能在1945年后的国际关系史中表现尤其明显。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学者对东亚安全结构与北约形成的对比研究也表明,东亚地区国家间存在着同质性差距过大、缺乏共同的历史认同,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二战后东亚安全结构的特征为安全困境。

总之,从理性主义和认同身份两个角度推理,国家同质性与联盟信任形成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交易成本的降低与身份认同的形成发挥着干预变量的作用。

假设 1-1: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缔约国家之间同质性越大,联盟形成时就越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

### (二) 不确定性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不确定性是缺乏有关过去、现在、将来或假想事件的过程的确切知识。就一具体决策而言,不确定性可能在强度、相关性以及可能排除性上存在着差异。”我们可运用不确定性来分析联盟选择与形成时的“政

---

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1816—1992,”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2, 2000, pp. 203—227.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pp. 575—607.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71页。理性选择理论承认决策时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也是从不确定性出发并认为人们决策中偏差的存在。参见 Daniel Kahneman, Paul Slovic and Amos 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策选择结构问题,包括联盟政策选择偏好的变化、信息沟通不灵所引起的结构性不对称问题,以及由于行为体机会主义倾向所造成政策行为上的不确定性。

从制度选择的交易成本而言,如果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不确定性越大、国家间交易成本越高,那么相关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高的国际制度形式;反之亦然。信任其实是国家间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工具;因此,如果不确定性越大,那将导致国家间交易成本增大,所以相关国家会理性地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信任类型作为缔约联盟的基础。从上述逻辑推论,我们可以认为,如果相关缔约国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那么越有可能形成情绪性的信任。因为相比较而言,情绪性信任更有助于降低相关国家的治理成本。

国家做出结盟选择时,如果面临的选择机会越少,即不确定性越少,那么联盟国家的选择机会就越小,自身的选择动机也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国家缔约而成的联盟组织更有可能形成工具性信任。反之,在不确定性更大的结构环境下,相关缔约国所形成的信任更可能是情绪性的。比如,在关于联盟困境的研究中,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指出多极体系中联盟困境比两极体系中更为严重,联盟国家更有可能遭到盟友背叛。这与上述信任形成的理性选择预期不太一致。从理性选择理论而言,不确定性越大(多极)比不确定性小(两极)结构下的联盟更为稳定,因为基于情绪性信任的联盟比基于工具性信任的联盟更为稳定。对此,我们先遵循从理性/有限理性假定出发的理论推演逻辑,进一步确定如何去衡量与比较不确定性的太小问题。

---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笔者这一论断建立在缔约国之间均形成情绪性信任的前提下,所以不确定性越大,联盟就越稳定。但是,联盟信任存在非对称性的特性,即单方面的情绪性信任容易诱发信任风险。不确定大小也能反映联盟选择时的动机选择,这一假说的解释效力仍需要在国际关系经验事实中加以证实。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谁之不确定性?联盟缔约国的不确定性,还是分析家的不确定性?不同认知主体间的信念差异,导致各自推论存在差别。斯奈德从分析者身份出发,认为联盟困境的可能性,这是结构层次的判定。笔者从不确定性的现实出发,强调缔约国倾向于选择情绪性信任,作为克服不确定性的理性手段。这是从缔约国的“愿望”出发,建立在对缔约国的一个基本动机预设之上:缔约国的联盟动机的“向善”性,即联盟缔约国希望缔造一种稳定的、充满温暖感觉的联盟大家庭——情绪性信任。反之,如果缔约国的动机相反,就无从谈论“情绪性信任”的生成。

如何确定联盟选择时的不确定性呢?在本文中,笔者借鉴了现有的交易成本分析所创建的指标体系。“由于导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多,我们在现有的研究技术下不可能为其确立一套非常严密的评估指标。但是,如果给定具体的情境,我们可以在比较的意义上大致说出不确定性的。”判定与比较不确定性大小的第一种路径,就是观察在具体情境下联盟缔约国所面临的联盟对象与潜在联盟对象。如果联盟缔约国所面临的联盟对象以及潜在对象越多,那么联盟形成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第二种路径为观察相关行为体的接发信号,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信号传递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对于信号的解读在国家如何判定潜在盟友是否会帮助自己等相关战略互动中至关重要;信号的解读方式取决于我们的需要、理论与预期等。对于如何分析与比较信号情况从而揭示不确定性的大小,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从信号的清晰性、一致性和传递成本来判断不确定性的大小。”

第三种指标为外生震动,即外部环境中发生的急剧变化,如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局部战争、军事政变等。冷战的结束、两级体系的终结这种国际体系大环境的改变为国家联盟选择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由于外生震动一般是相关缔约国没有预期到的,因此它的发生必然会对行为体的偏好、信息以及政策环境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基于理性/有限理性假定,以交易成本分析者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为基础,笔者认为不确定性的结构环境与联盟信任形成与选择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从而可以得出弱式理性主义解释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1-2: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缔约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联盟形成时就越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

### (三) 社会交换程度

如果把联盟信任当作一种交换的“礼品”,那么就进入了社会交换论视角

---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第 101页。

Robert Jervis, “Signaling and Perception,” in Kristen Monroe,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NJ: L. Erlbaum, 2002), pp. 293—312.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第 103页。

同上。

下的联盟形成理论探讨。社会交换视角认为联盟的形成是社会交换的产物,这在力量非对称性联盟形成中尤为明显,因为联盟可以产生两种基本的利益,即自主和安全。在社会交换理论的逻辑中,信任是社会交换的产物,也是社会交换的基础与手段。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Peter M. Blau)指出:“因为信任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非常重要,又因为交换义务可促进信任,所以就有特殊的机制使义务永存并因此加强了感激和信任的纽带。”社会交换建立在交换者一方对另一方的期望与信任之上,尽管这只能是微不足道的信任,因为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交换并给予回报,显然是属于互惠的交换关系。但是,社会交换需要以信任为基础,并促进交换双方的相互信任发展。

这种建立于逐步交换的信任增长机制类似于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一报还一报”的博弈策略。阿克塞尔罗德发现,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一报还一报”的博弈策略是最佳的合作方式,能达到最好的互惠结果。作为社会交换的基础与产物的信任演进观,体现了理性交换视角下的乐观态度。这种利他主义的进化论思想已有生物学、经济学和进化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支持。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J. Field)认为,不仅在个体层次,在群体层次也能形成人类互惠互利的合作(组织)。信任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再生道德资源,其再生性在于其用则进,退则废。与传统理性社会交换论不同的是,现代社会交换论中的情绪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良性的社会交换能产生积极的情绪,因为互惠的结果会进一步刺激积极情绪的产生。也就是说,社会交换程度的上升,可能带来情绪性信任的增加。此外,社会

---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s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 905.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张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第116页。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110—111页;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第278—289页。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104页。值得注意的是,阿克塞尔罗德否认信任的重要性。

亚历山大·J.菲尔德:《利他主义倾向: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赵培等译),长春出版社 2005年版。

帕萨·达斯古普塔:《作为商品的信任》,第66页。

Edward J. Lawler and Shane R. Thye, "Bringing Emotions into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5, 1999, pp. 217—244.



交换过程中,交换行为体的知觉、归因因素也日益得到重视。比如,情感与公平合理两个概念也被引入交换理论。当交换者感受到交换过程及结果的公平性时,将会体验到积极情感;反之,则为消极情感。当交换符合主体的预期时,人们体验到积极情感;反之,则为消极情感体验。

观察社会交换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对外援助、文化交往与人员往来,以及经济贸易数额等。为了简化指标体系,以及与联盟形成的具体情境相结合,笔者以联盟缔约国当中对外援助的具体数量为分析指标。如果缔约国之间对外援助的数额越大,则联盟形成过程中或者在盟友之间越有可能形成情绪性的信任。这符合“情绪来源之一为理性行为”的预设。

假设 1-3: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缔约国间社会交换程度越高,联盟形成时就越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

#### (四) 共有威胁知觉

防御性军事联盟建立的直接原因与功能在于应对外部与内部的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是客观存在,还是一种主观上的建构)。从群体凝聚力的角度来看,群体共同外部威胁的存在,客观上会促进群体的内部团结与认同。所以,如果缔约国之间共有威胁知觉越大,那么联盟形成时就越有可能形成情绪性的信任。因为共有威胁知觉越大,联盟群体中诸如友爱、忠诚等积极情绪就会越多,从而更容易产生情绪性信任。

沃尔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制衡论认为,如果国家受到威胁的知觉越大,就越可能寻求联盟的方式以制衡威胁,联盟产生于国家制衡威胁的过程当中。沃尔特提出了衡量威胁知觉程度的四个指标,即总体实力、地理相近性、攻击能力和侵略意图。在这四个变量中,前三者的衡量与评价较为便利;第

---

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48 和第 163 页。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Ibid.*, p. 5.

四个变量(侵略性意图)是影响威胁知觉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如何判定意图/信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杰维斯认为,首先我们很难确定和把握别人的真正信念与意图;其次由于信念因素本身具有的复杂性,难以建立一套客观衡量指标。因此,他提出“理解信念”的命题。对于如何度量知觉,杰维斯并不赞同建立“科学化”模型,而是认为尽量采用有大量历史证据且得到历史学界共识的案例,并且注意对个案的不同解释,同时将这些个案看作是可能性和假设性的例子。

另有学者从威胁知觉的“表征过程”提出四个衡量指标,具体包括决策者的自我表述、旁观者的表述、决策者应对威胁的替代方案准备以及决策者应对威胁的动员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沃尔特的衡量指标为基础,结合其他学者的论述,具体分析决策情境中的表述与应对过程,尽量采取在历史研究中已“定性”的个案。从这个角度看,在联盟缔造过程中,如果缔约各方的共有威胁知觉程度越高,那么形成的积极情绪就越多,由此更可能形成情绪性信任。

不过,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缔约国威胁知觉之间的相似性与缔约国威胁知觉的程度。前者的前提是不同缔约国关于威胁的认知存在差别,而后者在基本认可缔约国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情况下,分析它们共同威胁知觉的程度问题。如果缔约国具有一致的威胁知觉,那么这种联盟所形成的信任情绪水平比未形成一致威胁知觉的联盟要高。再次,笔者主要比较共有威胁知觉的程度,这种比较更适合于多个案例或同一案例不同时段比较。

假设 1-4: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缔约国间共有威胁知觉程度越高,联盟形成时就越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

---

Stephan Haggard, "Structuralism and Its Critics: Recent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 eds.,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21—422.

Robert Jervis, "Understanding Belief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7, No. 5, 2006, pp. 641—663.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导言,第 34页。

Raymond Cohe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p. 24.

## 二、联盟信任生成机制的社会归因理论解释

大部分联盟信任是在工具性信任与情绪性信任的连续谱上选择。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联盟信任何时产生?以及产生的是倾向于哪种信任类型?这些问题构成了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的联盟信任形成问题。理性选择理论只能揭示哪些理性变量有助于情绪性信任的产生,而并没有继续探究为什么、如何以及何时产生的问题。

要理解联盟信任如何在盟友当中产生,就必须了解在联盟群体和盟友个体层次,盟友之间以及盟友与对手之间(观察者和行为者)是如何互相解释相关行为、如何进行因果推论的。如果我们把某一行为及事件结果归因为对方的属性因素,那么会产生人际间的情绪,包括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如果我们归因为情境因素,即任何行为者在这种情境中都会表现出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归因就很难产生积极情绪。情绪性信任的核心在于我们对盟友的可信性以及内在属性的一种安全信念,而这种安全信念的基础在于盟友间积极情绪的产生与维系。因此,行为体的内在属性归因是情绪性联盟信任产生的必要条件。情绪性信任与决策者关于声誉的知觉紧密相关。因此,盟友之间良好的声誉是情绪性信任形成的必要条件。如果盟友间形成了良好的声誉,那就有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我们运用归因理论解释情绪性信任形成的途径之一就是观测声誉的形成。

盟友间情绪性信任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观察者(决策者、联盟成员或盟友)必须将盟友的行为及结果,或者联盟的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而不是外在情境(当然,如果我们把消极结果归因为情境因素,同样也可以产生积极情绪,或至少不会产生消极情绪);第二,观察者(决策者、联盟成员或盟友)必须运用这种解释去预测和解释盟友或联盟组织的未来行为或事件

---

J. Mark Weber, Deepak Malhotra and J. Keith Mumighan, "Normal Acts of Irrational Trust Motivated Attributions and the Trust Development Process," in Barry M. Staw & Roderick M. Kramer,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27, 2005, p. 17.

D. Harrison McKnight, Larry L. Cummings and Norman L. Chervany, "Trust Formation in New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www.msrc.umn.edu/wpaper/WorkingPapers/9601.pdf](http://www.msrc.umn.edu/wpaper/WorkingPapers/9601.pdf), p. 31.

结果。

情绪性信任包含了对于信任方可信性、可依赖性的“安全信念”,其实就是对未来的“可重复积极行为”的信心。默瑟 (Jonathan Mercer)认为,声誉只能由观察者的属性归因而产生。这是因为,属性归因可以确保行为者在不同情境中仍会做出相同的行为反应,比如即使自己的盟友将来实力下降,但它仍会信守承诺。但是,情境归因无法产生声誉。因为情境归因并不具有跨情境性,即在不同的情境中,由于外在情境的压力不同,行为者的行为反应会大相径庭。属性归因对于声誉产生的必要性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联盟信任的产生可以不需要属性归因,但是情绪性信任的产生必然要建立在属性归因的基础之上,因为情绪性信任内在包含着一种“安全信念”。

工具性联盟信任仅仅包括认知的维度,并没有情绪性的安全信念。因此工具性信任仅仅是战略性与计算性的认知,并不能保证盟友间的承诺的可预测性和跨情境性。所以,与情绪性信任产生相反,如果我们运用的是情境归因机制,那么联盟组织内部形成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信任。总之,联盟信任的产生归因机制可简要表述如下:

将(潜在)盟友的行为归因为内在属性 产生情绪性信任

将(潜在)盟友的行为归因为外部情境 产生工具性信任

### (一) 期望、合意与联盟信任

归因是一种事件与行为的因果解释,包括知觉与判断(推理)的心理学过程。人的知觉过程往往是由理论主导的,而不是由事实主导。观察者的认知结构对于其知觉过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在讨论决策者因果归因时,必须分析预期或已有信念对行为或事件归因的作用。

---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6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143页。

首先,显著性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归因方式。而在“证实归因模式”看来,人们倾向于将预期之外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将预期的行为归因为属性因素。在此,预期实际上起着显著性因素的作用,因为“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我们所归因的”。在相应推断理论的归因逻辑中,人们对行为直接进行属性归因。比如,玛丽将自己的钱捐献给公共事业,那她就被看作是一个大方、慷慨的人。但是,“证实归因模式”中将归因条件进一步限定为:当且仅当行为是人们所期望时,才会进行属性归因;相反,如果行为在人们期望之外或与期望相背,那么我们就将这种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只有当我们认为玛丽是一个慷慨的人时,这才将她的捐赠行为归因为她是一个慷慨的人;如果玛丽并没有捐赠,那么我们会寻求情境的原因。因此,期望因素成为“证实归因模式”的核心变量与条件:

预料的行为 属性归因

意外的行为 情境归因

那么,期望归因与联盟信任形成具有何种关系呢?首先,如果以实际联盟条约缔约为标志,联盟形成过程中盟友与对手是一个逐步显现与形成的过程。其次,我们必须进一步确定观察者如何确定潜在盟友的期望,换言之,观察者对潜在盟友的期望是什么?“预料的行为”是什么?一般而言,联盟组织的软力量在于军事互助承诺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观察者对于(潜在)盟友的期望是对方会做出积极的行为,或者说令人满意的行为。“如果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盟友,那么,其中一个国家的决策者不用太多信息就会相信对方是潜在的忠实盟友。”这种“远亲”盟友关系的国家会对潜在盟友产生积极的期望,更不用说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准盟友。

在确定盟友归因中的期望后,我们可以得出基于期望的联盟信任归因假设:当潜在盟友符合我们的期望,即做出积极的行为时,我们把这种行为归因为

---

James Kulik, "Confirmatory Attribution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Social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4, No 6, 1983, pp. 1171—1181; Jennifer Crocker, Darlene Hannah, and Renee Weber, "Person Memory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4, No 1, 1983, pp. 55—66.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4.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144页。

属性因素;当潜在盟友不符合我们的期望,即做出消极的行为时,我们把这种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如果遵循这种逻辑,联盟形成时盟友的信任形成应倾向于情绪性信任。因为积极行为归因为属性是情绪性信任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基于期望的联盟信任归因逻辑上没有问题,但与经验现实存在矛盾。盟友间经常将消极行为归因为对方的内在属性,由此导致联盟内部疑虑情绪重重。当然,这种归因假设对于解释对手之间不信任来源,却比较贴切和有力。当对手符合我们的期望,即做出消极行为时,我们把这种行为归因为属性因素;当对手不符合我们的期望,即做出积极行为时,我们把这种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这种解释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手之间的信任(不论是工具性信任还是情绪性信任)很难形成。

遵循默瑟关于声誉归因的解释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期望在联盟归因时的局限。因为对声誉的认识影响人们关于盟友的期望,而期望又反过来影响声誉的形成。我们把声誉看作是盟友间的一种情绪,而盟友间的情绪性信任也是一种情绪。如此,我们的分析对象可以抽象化为联盟归因如何产生联盟情绪。如何化解期望作为自变量的局限,默瑟进一步提出了将行为的合意性作为归因的决定因素:

正因为这种可能性,以及将期望假设推演到盟友时的问题,我将行为的合意性作为归因的决定因素。这种从期望到愿望的转化,使我能够运用证实归因的一般发现,而不至于陷入同义反复的危险。

通过将政策的成功与失败,亦即愿望/合意程度作为我的自变量,我就避免了循环论证的风险。我通过决策者政策的成功来判定合意。政策成功亦即合意;政策失败亦即不合意。由于以政策成功(或者合意与不合意的结果)作为我的自变量,我的因果变量进一步消除了基于期望的声誉模式的不当之处。

基于合意/愿望的归因模式是既强调认知因素又立足于动机的信任归因。情感因素也会影响归因的方式,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诸如喜欢与不喜欢等,都能影响人们的知觉与推断。通过转化为合意变量,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决策者而言,最为显著的因素是政策的成功与否。基于合意的归因方式,与诸

---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0.

*Ibid.*, p. 61.

如“自我服务”以及“自我中心”归因偏差的论述逻辑一致。“自我服务”归因偏差是指个体倾向于接受成功的努力,将成功归因为个体的内在属性,而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诸如错误的期望、对成功的渴望以及保护自尊等,促使了“自我服务”偏差的产生。“自我中心”归因偏差是指对于共同完成的事件或结果,个体倾向于高估自身的因素,即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综合上述各种归因偏差,我们从期望转化为合意/愿望归因方式,这种基于合意的归因方式认为:人们倾向于把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为他者的属性因素,而将合意的结果归因为情境使然:

不合意的行为 属性归因

合意的行为 情境归因

### (二) 社会认同与联盟信任:从人际归因到群际归因

联盟关系是一种群体关系,所以我们运用归因理论必须进入“社会情境”的归因分析,即从人际归因到群际归因或群体内归因的转化。“群际归因是指,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如何解释他们自己和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与后果)时,所采用的方式和路径。”

群际归因及误差的心理来源机制可以分为知觉因素与动机因素。在知觉层次,内群体成员将显著因素进行社会分类,这将有意识或无意影响到归因方式。当然,建立于认知基础之上的预期也会影响到群际归因的方式。在动机层次,“最为明显的群际归因动机基础是正面看待自己群体的愿望,由此进一步获得、保持以及维护个体的自尊。所以,归因的群际偏差能够被看作是更大过程

---

Joop Van der Pligt and J. Richard Eiser, "Actors' and Observers' Attributions, Self-serving Bias and Positivity Bia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1983, pp. 95—104; Philip E. Tetlock and Ariel Levi, "Attribution Bias: On the Inconclusiveness of the Cognition-Motivation Deba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8, 1982, pp. 68—88.

Michael Ross and Fiore Sicoly, "Egocentric Biases in Availability and Attribu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7, No. 3, 1979, pp. 322—336.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3.

Miles Hewstone, *Causal Attribution: From Cognitive Processes to Collective Belief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sil Blackwell Inc., 1990), p. 166.

的一部分——对积极社会认同(或群体自尊)的追求。”这种动机偏差,来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群体服务偏差”,即在群际归因中,内群体成员倾向于对内群体成员的合意行动进行内部归因,而对不合意行动进行外部归因;外群体成员则恰恰相反。由于群体间这种归因偏差的存在,因此相伴而来的是不同群体间冲突与竞争,进一步的发展则为种族中心主义。

群体关系中的内群体偏爱,已为大部分社会心理实验所证实。如一些尊重性的社会行为更倾向于归因为内群体成员,而不是外群体成员。这与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F. Pettigrew)对偏见与归因关系的研究逻辑如出一辙。在对偏见的研究基础上,他进一步将群体偏见与归因方式联系起来,提出了偏见群体归因的“最终归因偏差”。这种归因偏差认为,内群体成员倾向于将外群体成员的负面行动归因为内在属性原因,内群体行为则相反;而对于外群体的正面行动,他们倾向于归因为情境因素。我们假定联盟形成是一种外群体的形成,所以,在这种外群体分类的基础上,潜在盟友的归因假设为:观察者倾向于把潜在盟友的合意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而把不合意行为归因为属性因素。

以社会认同程度为区分标准,国际关系中的正式军事联盟可分为倾向于战略性或认同性的联盟,由此可以区分出社会认同程度的大小。联盟的直接目的与功能在于安全合作与互助,所以绝大部分军事联盟倾向于战略性联盟一端,这就是我们对联盟形成外群体形成的假定。但是,认同性联盟也不可忽视,同一联盟不同时期战略性与认同性偏重也可能不同。不同的联盟社会认同及潜在盟友社会分类,导致不同的联盟归因方式。如果联盟形成时,联盟的认同

---

Miles Hewstone, *Causal Attribution: From Cognitive Processes to Collective Beliefs*, p. 195.

*Ibid.*, p. 171.

Marilynn B. Brewer, "The Role of Ethnocentrism in Intergroup Conflict," in Stephen Worchel and William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86), pp. 88—102.

Martin G. Beaupré and Ursula Hess, "In My Mind, We all Smile: A Case of In-group Favorit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2003, pp. 371—377; Ruth Gaunt, Jacques-Philippe Leyens, and Stéphanie Denoulin,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the Attribution of Emotions: Control over Memory for Secondary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Ingroup and Outgroup,"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2002, pp. 508—514.

Thomas Pettigrew, "The 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 Extending Allport's Cognitive Analysis of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5, No. 4, 1979, pp. 461—476.



转化为内群体,那么我们将发现盟友间积极情绪程度很高,外在表现为盟友既不会因负面行为受到谴责,又因积极作为而深受盟友的感恩。由此这种联盟是一种“我们的联盟(表-1)。为何有的联盟形成是一种外群体的形成,有的联盟形成是一种内群体的形成?同一联盟又如何实现社会认同的变化,即由外群体演进为内群体,或与之相反?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外群体向内群体“演化”的条件问题。

表-1 社会分类与联盟归因方式

结果类型	认同性联盟内群体	战略性联盟外群体
合意(成功、正面)	属性 (内部、稳定、不可控制)	情境 努力(内部、不稳定、可控制) 运气(外部、不稳定、不可控制) 任务(外部、稳定、不可控制)
不合意(失败、负面)	情境 努力(内部、不稳定、可控制) 运气(外部、不稳定、不可控制) 任务(外部、稳定、不可控制)	属性 (内部、稳定、不可控制)

资料来源: Miles Hewstone, *Causal Attribution: From Cognitive Processes to Collective Beliefs*, p. 174. 笔者做了部分调整。

关于社会认同或分类的演进问题,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没有具体的阐述。国际关系学者一般倾向于将联盟看作是战略合作的一种形式,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是如此。因此,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威慑理论均认为情绪对于联盟的形成、稳定与变迁无重要意义。在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关于群体认同的讨论中,大部分文献在外群体与内群体区分的基础上,讨论这种区分的后果,而很少讨论这种认同区分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相互转化的。有鉴于此,从行为者属性和外在环境压力两个层次,我们可以提出联盟外群体向内群体演进的两个相关条件:高度的国家同质性和高度的共有外在威胁知觉。

在理性主义模式中,笔者主要从理性观察者的角度,阐述上述两个变量与

---

Rupert Brow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0, No. 6, 2000, pp. 745—778. Leonie Huddy,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ohesion," in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11—558.

信任形成的相关关系,同时也指出它们作为认知变量的意义。在此,笔者以行为体的社会认知角度分析同质性与威胁知觉两个变量与群体分类演进的相关关系。简言之,前者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分析,而这里是以当事者的认知角度分析。群体的区分必然包含着社会比较的过程,而比较的立足点是对相关行为体同质性的认知。因而,社会比较、相似性与内群体偏差是相互连接与促进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Muzafer Sherif)的现实主义利益冲突论认为,共同的经济利益目标促成了内群体的团结和外群体的敌视。这种论证逻辑与笔者关于同质性的假说一致,都强调一致性对于群体分类的影响。本文所说的高度同质性,是指潜在盟友对相关行为体相似性的认识,这种知觉建立于客观的同质性基础上,但并不必然反映现实的相似性情况。所以,在北约国家内部,加拿大人认为与美国人很相似,同质性很高,但美国人却并不怎么认同加拿大人。高度国家同质性与其说是客观情况,毋宁说是主体间的信念。由此,联盟内部成员的同质性信念存在着不对等的情况。在本文中,衡量“高度国家同质性”的指标包括两部分,其一为不同行为者同质性信念的绝对大小,其二是不同行为者之间信念的分歧大小。如果行为者之间分歧越大,国家同质性作为认知变量的取值就越小。

联盟的外在威胁,包括符号威胁与现实威胁都能促进群体认同的发展。威胁压力产生内群体团结和群际冲突,这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共有威胁知觉的强度与群体分类的演进具有相关性。联盟成员或潜在盟友之间共有威胁知觉的程度越大,就越可能向内群体认同/分类转化。关于这种认知变量,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共有威胁知觉到什么程度,才能

---

J. Turner, "Social Comparison, Similarity and Ingroup Favouritism," in Henri Taj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p. 235—250.

Michael A. Hogg and Dominic Abrams,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 1988), pp. 42—48.

默瑟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指出了这种同质性的不同含义或分歧,这也是客观与主观标准的区分。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国家同质性既可以作为理性变量,又可以作为认知变量。在上一节的理性主义解释模式中,笔者将同质性作为理性变量;而在此则把同质性作为认知变量。

Leonie Huddy,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ohesion," pp. 539—542; John Duckitt, "Prejudice and Intergroup Hostility," in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559—600.

形成内群体的认同?本文仅仅回答了盟友间共有威胁知觉程度与群体认同演进的相关性,而对于具体的转化时点,现有研究与理论很难提供准确的预测。其实,群体认同程度的增加可以带来群体情绪与凝聚力的增强,反过来,群体情绪也可以增强对群体的认同。

通过分析同质性与共有威胁知觉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可以解释盟友间信任程度的非对称特性。不同联盟组织内部信任程度不同,同一联盟组织或联盟形成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体之间形成的信任也不是对等的。国家同质性是一个认知变量,所以不同行为体对于同质性的强度存在认识差别,这种认知分歧直接影响群体分类,进而影响群体归因方式。所以,就盟友单方面而言,认知变量和群体分类等方面的差别是盟友间信任程度不对称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意义上,认知变量的解释力要强于理性变量。

总之,我们可以对联盟信任的形成做出如下假设:根据群体认同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或阶段。

当联盟形成过程中形成的是外群体身份时(这也是本文的基本研究假定,亦即大部分战略性联盟的缔造都是外群体的形成),观察者将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外在情境,则可能或倾向于产生工具性信任;观察者将不合意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则可能或倾向于产生工具性信任。这种解释机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联盟信任基本是工具性、战略性和计算性的,这似乎为现实主义理论描绘了一幅微观图景。换言之,我们永远不要永远相信我们的盟友!

假设 2-1:联盟形成过程中,观察者(决策者)将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外在情境,则可能产生工具性信任。

假设 2-2:联盟形成过程中,观察者(决策者)将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则可能产生工具性信任。

但是,当联盟群体成员之间关于国家同质性和威胁知觉的信念强度增加

---

这一理论上的困难可以通过转化为经验层次而加以解决,即可以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追踪威胁知觉与认同转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认同转化时点的研究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确定一种认同分类与衡量的标准,测定外群体向内群体的转化。对此问题,存在两种解决路径,即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我倾向于经验测定的路径,因为抽象理论层次很难提供确切回答。

Thomas Kessler and Susan Hollbach, "Group-based Emo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Ingroup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1, 2005, pp. 677—685.

时,联盟形成过程中可能产生群体身份的变化,或者不同的行为者关于群体身份的认知会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外群体身份向内群体身份的演进。由于群体身份的转化,这时社会归因的方式也随之改变,即内群体的身份明显会产生内群体偏好的结果。所以,当联盟群体内部内群体身份认同产生后,联盟信任形成的假说则随之变化,亦即观察者将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则可能或倾向于产生情绪性信任;观察者将不合意结果归因为外在情境,则可能或倾向于产生情绪性信任。这种解释机制说明了“我们”的共同体之真正产生。

假设 2-3:联盟形成过程中,观察者(决策者)将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则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

假设 2-4:联盟形成过程中,观察者(决策者)将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外在情境,则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

### 三、理性主义与北约联盟信任形成

二战后,美国在西欧安全关系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但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意图一直存在怀疑、猜疑的一面。换言之,美国对西欧的联盟信任是逐步形成的。随着信任的建立,美国才与西欧国家共同缔造了其在和平时期的第一个正式军事联盟。以下我们将以北约为案例,比较分析不同信任主体的信任形成过程。

#### (一) 国家同质性

在本文中,考察跨大西洋联盟内国家同质性的两个指标为:共产党人参与

---

联盟的意义在于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互助承诺与义务,这可从联盟条文中反映出来。条约的存在并不能保证盟友不背叛,非正式联盟不需要条文约束。前者如美国独立初期的法美联盟,后者如美以非正式联盟。北约的军事承诺与义务主要体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之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此等武装攻击及因此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均应立即呈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时,此项措施应立即终止。”参阅《国际条约集》(1948—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版,第 193页。

政权的情况,以及法国对德国疑惧的弱化。二战结束前后,东欧国家相继建立起了共产党执政或联合执政的政权;法国、意大利以及比利时等国家的共产党声望大增,均在各自政府中占据一定的席位和要职。共产党力量的参政议政,成为美国担心自由世界受到威胁的依据,阻碍着美国对西欧安全做出承诺。所以,在北约联盟缔约谈判过程中,国家基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甚至是地理位置上的相关性,都成为联盟缔约国以及吸收成员国的标准。如在1948年7月至9月的七国大使委员会会议当中,“成员国应不应有不同类型”这一条款成为各方讨论的重点,而且会议结束时也未达成共识。就此而论,如果西欧法、意等主要大国的政府体制内共产党人仍然十分活跃,美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将无法实现,即美国无法与共产党参政或执政的西欧国家形成联盟信任。

美国对法国国内政治走向极为关心,为此美国政府对法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47年2月27日,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白宫秘密会议上,对法国的共产党力量危言耸听。他说:“在法国,有四五名共产党部长,其中一名是国防部长;共产党控制着最大的工会并在政府各部、工厂、部队中安插大量人员;法国选民将近1/3投共产党的票;法国经济情况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随时都可以下手。”1947年4月下旬,驻法大使向法国拉马迪埃暗示,如果法国政府内共产党力量不再参政,那么法美关系将会顺利很多。随后不久,1947年5月4日,法国拉马迪埃内阁中有五位共产党阁员因拒绝辞职而被总统免去职务。到年底,法国共产党在行政当局中的影响日渐式微。

---

从地理位置来看,由于意大利不属于大西洋地区,法国坚持反对意大利加入北约。最后基于政治与地缘战略考虑,意大利问题得到解决。

尼古拉斯·亨整森:《北约的诞生:一个筹备者的记实》(龚维新译),载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史料(四)》,1983年,第16—28页。

西欧各国共产党被排除出政权的具体时间为:1945年11月,奥地利大选中共产党失利;荷兰战后政府中没有共产党人参与;1947年3月11日,比利时担任部长的共产党人辞职;在卢森堡,因试图执行早期联合政策失败后,1947年3月1日组成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以上共产党人相继在西欧行政体制中出局,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因恐惧而干预有关。随着共产党人在西欧各国的“失利”,我们可以认为西欧各国进一步向美国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国家迈进。如此增加了美欧国家同质性,美国倾向于进一步对欧安全做出军事承诺与义务。

转引自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徐先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1页。

1947年初,美国正式开始采取敌视欧洲共产党人的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欧洲盟友丘吉尔也发表了铁幕演说。此后,整个西欧共产党人均受到排挤。在驻意大使的建议下,马歇尔提出以经济援助换取共产党人离开政府。5月20日,马歇尔正式表态支持意大利,同英法商谈,修改和平条约。由此美意贸易谈判、军事援助开始,意“动用宣传工具制造舆论宣传美国重视意大利,支持意大利。”受外部力量的干扰,意共在接下来1948年4月的选举中失利。原因很简单,“人们知道,若是共产党人胜利了,必将出现一个危机时期,到那时,什么西方联盟,美国的经济援助可能会付诸东流。”因此,在西欧各国共产党力量离开政权组织后,北约联盟形成过程中更容易地形成了情绪性信任。

化解法德矛盾与历史宿怨是西欧国家安全、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尽管西德至1955年才加入北约组织,但我们认为法国对德国疑虑的消除,可以反映出北约缔造国之间同质性增大的事实。1945年之后,法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促使英国和美国承担欧洲大陆的军事承诺。在这种对外政策的指导下,法国先是与英国于1947年缔结了《敦克尔克条约》,应对苏联威胁。而后,法国欢迎美国加入并参与缔造美欧安全合作组织。但是,根据1947年的调查,北大西洋诸国的公众舆论中,法国人对德国人的戒备心与疑虑最重(图-1)。

法国普通民众以及决策者认为,“法国的民族利益需要一个衰弱的德国”,战后初期法国有两种可永远改变法德力量对比的办法。一是通过分割或有效的管制,永远削弱德国;二是建立法国发挥欧洲大陆平衡手作用的欧洲秩序。由于冷战危机凸显,苏联威胁上升,德国威胁逐步淡化。随着外在威胁感的转变,法国决策者对德政策理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这种政策选择变化,

---

乔治·博卡:《意大利共和国史话:从法西斯垮台到现在》(李文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同上书,第33页。

Michael Creswell,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our Friends’: How France Secured an Anglo-American Continental Commitment, 1945—54,” *Cold War History*, Vol 3, No. 1, 2002, p. 1.

Michael Creswell,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our Friends’,” p. 4.

W. F. 汉里德、G. P. 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徐宗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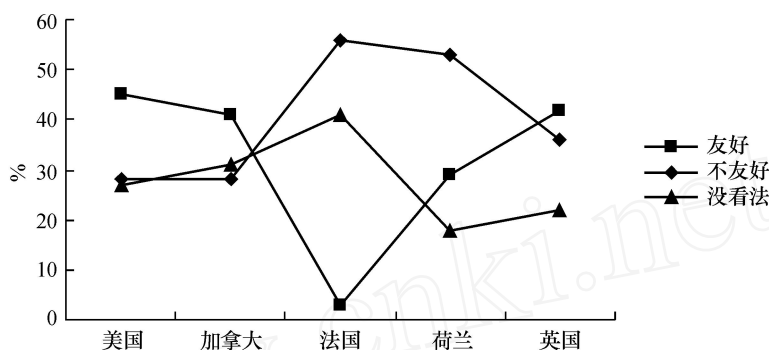


图-1 跨大西洋主要国家公众对德态度调查(1947年)单位:%

资料来源: John English, “ ‘ Who Could Ask for Anything More?’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NATO’s Origins, ” in Gustav Schmidt, ed , *A History of NATO: The First Fifty Years*, Vol 2 (London: Palgrave, 2001), p. 313.

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雷斯韦尔 (Michael Creswell)和马克·特拉亨伯格 (Marc Trachtenberg)指出:“机敏的法国决策者较早地认识到,苛刻的对德政策并非唯一选择,或许也不是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已经有可兹利用的替代方案,亦即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前进方向:将西德纳入西方世界的政策。”

苏联威胁的逐步升级冲淡了德国问题。德国不再是主要威胁,而且可能成为法国及西方世界的伙伴,因此要将西德全面纳入西方体系。此后,法国对德国的疑忌与不安大为缓解,北大西洋缔约国之间产生了情绪性信任。

## (二) 不确定性

二战后,对于西欧大国来说,“在安全战略上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苏联一边,在中间采取骑墙态度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充满危险的。”从力量对比来看,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优势十分明显,正好可以弥补西欧微弱的安全防御力量。基于当时的战略形势以及国家利益,法国和英国等西

Michael Creswell and Marc Trachtenberg, “ France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55, ”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2003, p. 8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第 204页。

欧大国主动邀请美国入主西欧安全义务。英国外交大臣贝文 (Ernest Bevin) 成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

战后初期传统的孤立主义在美国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大大制约着美国对欧洲安全做出承诺。从潜在的合作伙伴来说,美国的政策选择也存在很大的余地,即可以在西欧与苏联之间选择信任对象。尽管英美在战争期间已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但战后不久美国的种种信号表明,英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战后初期法国的基本目标也在于寻求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1947年至1948年期间,“当时大多数法国人不仅关切苏联军事侵略的可能性,而且还关切在法国本身的共产党接管的问题”,所以为了应对威胁,法国的求援信号自然发向了美国。

从信号传接过程来考察,欧洲也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其一是西欧需要美国军事力量继续维护欧洲安全;其二是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关于是否承担欧洲安全义务的辩论与争吵,让西欧大国忧心忡忡;其三是西欧大国也积极进行安全合作,同时向美国发出求援信号。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均向西欧国家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1945年之后,美国在西欧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美国拥有核武器,这可以让西欧大国在安全上略感欣慰,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自身的意愿如何,以及欧洲是否需要美国的保护。

美国和西欧在关于防务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美国倾向于欧洲先建立自身防御力量,而西欧倾向于美国时刻保证承担军事承诺与义务。在讨论北大西洋公约条文草案期间,美欧对于条文性质的态度迥然不同。美国倾向于以《里约

---

John English, “ ‘ Who Could Ask for Anything More? ’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NATO’s Origins, ” p. 306; Geir Lundestad, “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3, No. 3, 1986, pp. 263—277.

W. F. 汉里德、G. P. 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第239—240页。

同上书,第131—132页。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第206—209页。

Geir Lundestad, “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 p. 267.



热内卢条约》为模本,而西欧国家倾向于以《布鲁塞尔条约》的规定为基准。美国立场的不明朗和不坚决,使西欧国家决心在防御问题上自决自立。1948年3月3日,在西欧国家签订布鲁塞尔条约之前,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否认曾通知五国华盛顿打算对它们提供军事保证。他说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但在五国同意建立某种形式的西方联盟之前,还不能明确地提出一项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建立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布鲁塞尔条约》签订后,美国是否确定将对西欧安全做出坚定的承诺。美国国内政治对此也是纷争不断。以罗伯特·塔夫托(Robert Taft)为首的一批共和党人对行政当局的欧洲政策进行批评,认为应重点关注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与利益所在,这种信念在中国共产党获得全国胜利后更为突出。

战后初期美欧安全结构中,从潜在合作伙伴、具体的信号接发等多方面来看,西欧国家比美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确定性越大,那么行为体就有可能选择情绪性信任,以此作为克服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高制度化合作的途径。如此而言,西欧国家为了达成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合作,则倾向于形成情绪性的信任。这也是西欧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争取美国加入欧

---

Don Cook, *Forging the Alliance: NATO, 1945—1950* (New York: Arbor House/William Morrow, 1989), pp. 204—207. 《里约热内卢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及五十四条立即将关于其已从事的或在拟议中的为行使自卫权利的或以维持美洲国家间和平和安全为目的的各项活动之全面报告送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六条规定:“如果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或完整、或其主权、或政治独立遭受到非武装攻击的侵略的影响,或遭受到大陆以外或大陆以内的冲突的影响,或遭受到可能危及美洲和平的任何其他事件或情势的影响时,协商机关应立即召集会议以便商定在侵略状况下必需采取以援助受侵略的避难者的措施,或无论如何,应该商定为大陆的共同防御和维持其和平和安全所应采取的措施。”《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版,第521页。《布鲁塞尔条约》第四条规定:“倘任何一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其他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向受攻击的缔约国提供他们能力所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他的援助。”《国际条约集》(1948—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版,第50页。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147页。

John Baylis, “Britain, The Brussels Pact and the Continent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0, No. 4, 1984, p. 627.

对于同样是“多头政体”的西欧国家来说,它们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国国内政治中关于对外政策重点的辩论。所以,国会所带来的信号并没有混淆西欧国家的视听,而是这种不确定性增添西欧国家的担心。关于信号传递与接受的较为详细的说明,请参阅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第206—209页。

洲大陆军事承诺的原因。也就是说,北大西洋联盟形成过程中,西欧国家比美国更有可能形成情绪性信任。

不确定性的第三个指标是出现外部冲击。在北大西洋联盟形成过程中,这种外部冲击主要是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和西欧的攻势,由此引发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和安全恐惧上升。毫无疑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的安全防范对象就是苏联。联盟形成的动力来源之一也在于各缔造国之间的安全恐惧。如果恐惧越大,那么联盟就越容易形成,内部团结和凝聚力也就越强。同理,我们可以推知,联盟信任的情绪化水平也就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威胁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都成为联盟形成时情绪性信任形成与加强的催化剂。所以,当苏联的对抗行动进一步升级,加强对欧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北约各缔约国之间更倾向于形成情绪性信任。

### (三) 社会交换程度

二战结束后的欧洲,经济崩溃,百业待兴。到1947年初,“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整个西欧都滑到了深渊的边缘。”英国政府于1947年2月21日发表“1947年经济概览”白皮书,承认1946年英国财政赤字超过预计的三亿两千八百万英镑,达到四亿五千万英镑。经济低迷不仅预示着整个欧洲经济总崩溃的可能,而且由此带来的社会危机——共产党人力量的壮大,成为西欧各大国以及美国的“政治心病”。在这个转折时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推行的欧洲复兴计划拯救了整个西欧政治经济。

1947年3月17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聚首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但会议不欢而散。4月26日从莫斯科会议返回华盛顿后,马歇尔意识到“战后复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正在实现,战后国际合作也遭到失败”,欧洲政治和经济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4月28日,他就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广播讲话,“病人已经奄奄一息,而医生还在踌躇”。此时的美苏合作关系尽管没有全面破灭,但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的无果而终,进一步确证

---

皮埃尔·莱昂主编:《世界经济与社会史:二十世纪后半期(1947年至今)》(谢荣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页。

刘同舜等:《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页。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6页。

了战后美苏之间的合作已是穷途末路。所以,“真正放下铁幕的是莫斯科会议”,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合作的希望再一次被扑灭了。这种合作希望的破灭,使美国加快了有关援助欧洲的讨论并着手制定相关政策。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援助欧洲计划,马歇尔计划正式出台。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并于次日正式执行。从1948年4月3日至1951年12月31日,马歇尔计划执行的援助总额超过了120亿美元。在美国的援助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欧洲经济开始进入新的时代。

强调马歇尔计划政治动因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国会就不会批准这一援助预算,马歇尔计划也就无法实施。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强调,无论是否存在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都会实施援助西欧复兴计划,达到控制西欧的目的。马歇尔等美国决策者从欧洲返回后,与苏联合作及欧洲复兴的意念已破灭。而面对苏联共产主义日益凸显的政治与军事威胁,美国显得异常担忧。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共产主义威胁的增大,进一步促进美国出台了在欧洲的经济援助计划。

凯南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欧洲经济危机的根源,但共产主义会利用这种危机,因此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在这种观察下,他认为“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因素是在西欧恢复希望和信心,在那个地区及早复兴经济”。1947年3月初,在马歇尔即将赴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时,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就提醒国务院相关部门,美国即将对欧洲进行援助,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内部的饥饿和贫困已危及到民主国家的稳定。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是以经济手段恢复西欧经济,同时又能达到政治效果:防止苏联共产主义向西欧推进,消除西欧国家内部

---

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施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27—128页。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文件:关于美国援助西欧的政策》(1947年5月23日),载于刘同舜编:《“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第211页。

同上书,第209页。

的共产党势力,进一步巩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联盟。自由民主国家的巩固增大了跨大西洋国家间的同质性。而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增强了大西洋地区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和情感联系。

但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在欧洲的对抗行动。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1948年布拉格的红色政变,以及欧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分裂扩大。这种双刃剑效应与群体分类与群体积极情绪的消极后果如出一辙。换言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自信和能力,这种理性行为带来了美欧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亦即美国投之以“援助”,西欧报之以“信任”。同时,其代价是欧洲的分裂和“悲剧”。西欧对于马歇尔计划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1948年对外援助法”签署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立即赞扬马歇尔的政治家风度以及美国对欧洲的信任”。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也充满了对美国行政当局领导的感谢,“向马歇尔和艾奇逊最初提出计划时的胆略和勇气致敬,向范登堡、道格拉斯以及其他人在推动两院通过法案时所表现出来的技巧、耐心和干脆利落致敬。”

综上,情绪性信任作为一种“商品”,是西欧国家对美国经济援助的社会交换产品,因此当美国强化推行马歇尔经济援助计划后,西欧国家倾向于形成情绪性信任。

#### (四) 共有威胁知觉

在北大西洋联盟成立的过程中,美欧盟友双方的共有威胁知觉包括欧洲部分国家政权中的共产党人威胁和苏联威胁。我们在此着重探讨苏联威胁知觉的升级及其后果。

在联盟缔造双方中,西欧国家的威胁知觉要大于美国,当二者的威胁感基本相近时,美欧之间的联盟信任初步形成,北大西洋联盟组织正式成立。西欧国家在地理/地缘上紧邻苏联,加之欧洲历史上连绵征战的记忆,以及美国尚处于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争吵之际,西欧主要大国的苏联威胁知觉要比美国严

---

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第261页。

Lawrence S. Kapl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4), pp. 30—48.

重得多。只有当美国认为苏联的一系列行为意在扩张共产主义,威胁美国所称的自由民主世界时,美国对苏联威胁知觉才会逐步增大。

1946年至1947年初希腊和土耳其危机凸显,杜鲁门认为希土危机实质上反映了苏联意欲控制这两个地区的企图。他大肆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宣称这两个国家内外都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些国家孤立无援。这样做将在中东、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树立一个鲜明的榜样”,“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新威胁似乎与纳粹德国及它的同盟者所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因此,希土危机最为直接的结果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随后,美国推行了恢复欧洲经济自信的马歇尔计划。在美国看来,最为严重和直接的反弹就是1948年2月布拉格的“红色政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一事件使欧洲日益紧张的局势达到了顶点,突出了欧洲的不安全。”捷克政变反过来又强化了西欧各国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当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在《人道报》赞扬‘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对遵从外国帝国主义者指示行动的反动势力赢得辉煌胜利’时,欧洲其他的政治势力则把布拉格政变看作预示苏联对它们安全的直接威胁。”西欧各国对苏联恐惧的增大促使英国、法国和比、荷、卢三国的谈判增加了军事条款。1948年3月17日,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其中规定:“倘任何一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其他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向受攻击的缔约国提供它们能力所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他的援助。”德国威胁在条约中大大弱化,直接针对的对象便成了苏联。如此而言,布拉格政变直接引发了西欧的军事防务联合,促使西欧进一步呼吁美国承担欧洲安全义务。此时,美国仍处于孤立主义思潮的笼罩

---

根据冷战史学者的研究,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苏联没有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也是如此。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都很难以说是一体或一致的。相关的研究可参阅 Artiom A. Ulanian, “Soviet Cold War Perceptions of Turkey and Greece, 1945—58,” *Cold War History*, Vol. 3, No. 2, January 2003, pp. 35—52.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第115—116页。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页。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刘其中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116页。

《国际条约集》(1948—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下,国内政治的争吵阻碍了美国在和平时期向欧洲做出军事承诺。不过,6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范登堡决议》为美国排除了最后的障碍。

美苏柏林对抗促使美国改变了其对欧洲安全的态度。6月23日,在苏联下令封锁柏林的当天,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John Hickerson)把约翰·贝尔福(John Balfour)请至国务院,告诉了一个让他感到欣慰和满意的消息,即美国将正式开始跨大西洋安全事宜的谈判,因为《范登堡决议》的通过扫除了障碍。柏林危机所引发的美欧对苏恐惧,直接促使了北大西洋公约的形成。“西方各国虽然通过空中走廊粉碎了历时三百二十天的封锁,但是为了饿死二百五十万市民而对一个大城市进行残酷封锁这件事,却成了西方共同防御迅猛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指出:“俄国在柏林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粗暴和野蛮,使得许多欧洲人认识到,西方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军事支援,而这一点又导致最后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政治上来说,对柏林进行空运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加靠拢我们。”

柏林危机促进了美欧之间的团结,包括德美之间的团结。先前的战争对手经过“一番抗击共同敌人”的考验,“从此以后,任何不基于赢得美国人信任以使他们继续对柏林和西德对外政策都似乎是不能接受的。”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前后,欧洲另外两个事件同样改变美国对欧洲安全体系的态度:苏芬条约的签订,以及斯大林对挪威的进一步渗透。这两个事件进一步凸显了苏联的进攻意图,驱使美国开始考虑美欧之间成立军事联盟的具体问题。1949年4月4日,美欧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北约军事联盟协议正式成立。

1949—1950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体并未相应成立,仍缺少统一有效的武装部队。“由于缺乏思想感情的融洽一致,北大西洋联盟仍是软弱无力

---

Don Cook, *Forging the Alliance: NATO, 1945—1950*, p. 154.

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何处去?》(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页。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第150—151页。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第114页。

Lawrence S. Kapl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 p. 62.

的。”一些成员国不想承担更多的义务,联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的“侵略意图”引起了美欧的巨大恐慌。西欧认为这是苏联即将进攻欧洲的先兆。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关乎美国对盟友的声誉以及自由世界对抗苏联侵略的决心,所以把苏联类比为“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侵略者”。

此时美国对苏联威胁的知觉不仅仅停留于具体的物质目标和领土威胁,而且扩展至对美国权力地位及联盟声誉的威胁。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向欧洲增派地面部队、建立完整的北约军事联盟组织机构,同时组织西方联合军准备进入朝鲜。美国的担心在艾奇逊的话中表露无疑:“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如果朝鲜军队担当不了这个任务——这点看来十分可能——只有美国军事干预才能做到。……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此时的欧洲人陷入了舆论恐慌之中,苏联主导的朝鲜战争被认为是苏联下一步指向柏林的前奏。北约组织实体与军事一体化建设进一步得以强化。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美欧之间关于苏联威胁的共同知觉上升到新的高度,这解释了为什么当美欧共同的苏联威胁知觉上升时,北约形成过程中美国更有可能形成情绪性信任;以及当美欧共同的苏联威胁知觉上升时,北约形成过程中西欧国家更有可能形成情绪性信任。

#### 四、社会认知与北约联盟信任形成

在运用社会认知理论解释信任形成时,我们必须确定几个关于联盟信任形成的问题。首先,联盟信任形成是否有一个合适的时点?要回答这一问题,必

---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王希荣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第394页。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65—266页。

Ronald E. Powaski,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Security, 1950—1993*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pp. 4—5.

须做出系列假定。联盟信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联盟信任形成于联盟形成的前后时期,因为信任形成是联盟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从反事实推理来看,如果联盟形成时没有联盟信任的存在,联盟则无法形成。由此,联盟形成的前后阶段为联盟信任形成的具体时段。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从联盟形成前后的时段,选取我们分析联盟信任形成的具体个案。

其次,联盟信任在什么事件、时段中形成,或可以具体观测?联盟信任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联盟信任?联盟信任不仅成为维系联盟存在的必要软力量,同时也是盟友在“问题解决”中所依赖的“力量”。所以,在国际危机中,联盟信任表现最为明显,盟友也最需要联盟信任,换言之,国际危机是分析联盟信任的最佳个案。基于上述分析,笔者选取北约形成前后的两次国际危机(冲突),作为分析与解释北约联盟信任形成的具体个案:1948—1949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

### (一) 北约形成:外群体还是内群体?

在联盟信任形成的社会归因解释模式中,笔者详细阐述了联盟形成时,外群体身份向内群体身份演进的机制与条件:高度的国家同质性与高度的共有威胁知觉。随着西欧主要国家共产党人离开政权中心,西欧国家及其与美国之间的国家同质性进一步增大;法德矛盾的消解也增大了北约缔约国的同质性。

北约一方面是战略军事联盟,甚至有学者认为北约根本就不是总体规划而成的产物,更多地是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式采取实用主义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北约还是高度国家同质性国家形成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多伊奇等学者认为,维系北约存在与发展的内部基础在于北大西洋国家当中已经形成了“我们的情感。根据多伊奇的论述,在这种多元安全共同体当中,“共同体感觉”是“相互的同情与忠诚;具有‘我们的’情感,相互信任以及体谅;在自我意象和利益上至少具有部分的认同;具有预测相互行为的能力,以及根据这种预测行动的能力。总之,这是一种永久的注意、沟通、对于需要的知觉以及反应的问

---

John Baylis, *The Diplomacy of Pragmatism: Britain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O, 1942—49*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 123.



题。它不是静止协议的状况,而是动态的过程——即社会学习的过程。”

美欧缔造北约时,政治威胁主要来源于苏联对“自由民主世界”的威胁,亦即西欧国家内部共产党人以及苏联外在“进攻行为”的威胁。而军事威胁直接源自第一次柏林危机以及朝鲜战争。不管真实意图如何,斯大林在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所作所为都加剧了美国民众和政府中的苏联威胁观念。北约是两种不同国际与国内秩序观、世界观对立的产物。“苏联和斯大林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似乎构成了一种空前的威胁,比希特勒的威胁更严重”,“冷战反映出西方世界的国家和价值观受到威胁,实质上是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因此,北约形成过程中,外群体向内群体认同演进的基本条件均已出现。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相关缔约国家同质性的增大,北约形成时更有可能形成内群体的身份;同时随着相关缔约国家共同威胁知觉的增大,北约形成时更可能形成内群体的身份。

笔者之所以认为北约的形成是内群体身份的形成,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北约既是应对苏联政治与军事威胁的战略联盟,更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之上的共同体。从安全角度来看,北约很大程度上是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典型形态。“北大西洋公约不仅是组织和反击侵略的军事联盟基础,而且也是各缔约国全面合作的条规。”其次,北约的成立不仅仅是军事战略资源的形成,更是道德资源的形成。基辛格所指出,“大西洋同盟实质上不是同盟,而是具有道德的普遍性……总之,美国为了大西洋同盟可以赴汤蹈火,但是绝对不能称它是同盟。”这种道德的载体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工具性联盟,而是有着内在情感联系的共同体。第三,北约是安全合作多边主义的制度形式。这种多边主义制度形式的出现与跨大西洋地区共有的历史文化联系、语言、历史

---

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 129.

Thomas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74.

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第7页。

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何处去?》,第8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年,第413页。

集体记忆以及种族宗教等因素相关。所以,北约只出现于二战结束后的美欧安全合作领域,或者说它仅仅是个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

### (二) 信任形成: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1949年)

柏林成为冷战期间美苏对峙的桥头堡,1948—1949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成为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在冷战中的第一次对抗。这次危机也成为美苏为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共同体互相试探对方决心与声誉的一次实验,或者说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战。1948年3月20日,苏联代表退出了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着从4月1日起,苏联命令封锁了所有通向柏林的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至6月24日,苏联对柏林进行全面封锁,掀起了第一次柏林危机的高潮。此后,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柏林的对抗有张有弛,但都保持着克制与谨慎,直至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告柏林封锁结束。我们着重考察的是西方盟友如何看待、解释美国的应对行为,以及如何解释这次危机的结束。

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对此欢呼有余。但苏联却拒绝了美国的经济援助计划请求。杜鲁门指出,苏联对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反应是开始建设经互会,而政治与军事上的反应是柏林对峙的加剧。苏联“第二个更富于挑衅性的行动是在柏林发动一次军事冒险事件,目的在试探我们的决心和耐心”。美国把苏联的挑衅行动看作是对自身以及西方决心的挑战,认为美国及西方的反应直接影响到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声誉问题。

西方国家面对封锁将有三种选择,首先是武力突破封锁,其次是被逼无奈而灰溜溜地撤退,最后是接受苏联的条件,以保柏林无恙。杜鲁门意识到:“克里姆林宫所选定的目标——德国的故都柏林——也许是欧洲最敏感的地

---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斯蒂夫·韦伯:《构建战后均势:北约中的多边主义》,载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336页。

关于第一次柏林危机,请参阅 Michael D. Haydock, *City under Siege: the Berlin Blockade and Airlift, 1948—1949* (Washington: Brassey's, 1999); Robert E. Griffin and D. M. Giangreco, *Airbridge to Berlin: The Berlin Crisis of 1948, Its Origins and Aftermath* (Novato: Presidio Press, 1988)。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第138页。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72

方,因为它过去是、现在也是德国人的象征。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在柏林的地位,共产主义就会在德国人中间扩展势力。我们在柏林的地位是风雨飘摇的。如果我们想要留在那里,我们就必须显示一下力量。”6月28日,杜鲁门在讨论柏林形势时,态度坚决地表态:“这个问题无须讨论。我们留守柏林,就这样。”7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克莱(Lucius Clay)将军对杜鲁门总统分析了苏联的意图。他认为苏联只在于将西方赶出柏林,并没有迹象表明将会发动一场战争。出于降低危险性的考虑,杜鲁门最终采纳了空运的方式。

美国应对柏林封锁态度坚定,但行动谨慎小心,避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出于对苏联威胁的恐惧,英法等西欧大国希望美国驻军欧洲,以保欧洲免于斯大林的“侵略”。因此,美国的态度坚定十分符合西欧各国需要美军保护的意愿。但是,英法与美国的态度也存在差别,更倾向于通过长期的外交谈判解决问题。4月27日,英国转告美国,“假如俄国人挑起战争,英国将迎战,但英国还不准备‘采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为留在柏林而战的明确立场’。”在接下来与苏联人的谈判中,英法同样持较为缓和的态度。“英国和法国则态度较和缓,愿意在日复一日地执行令人瞩目的艰巨的空运任务期间继续谈判。”尽管西欧国家与美国的态度程度存在差异,但美国对柏林的承诺是西欧大国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图-2)。

对于美国的军事承诺与决心,贝文心怀感激,“众所周知,西方盟国中能够提供最大空中运输力量的是美国。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它确实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美国的合意行为最终产生了合意的结果,即苏联的态度逐步松动,向美国发出了降低封锁条件的信号。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柏

---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1946—1953),第142页。

Michael D. Haydock, *City under Siege*, p. 152

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第308页。

同上书,第310页。

苏联封锁柏林,并不出乎西方盟友的意外,但是美欧一开始对于如何应对封锁,也是众说纷纭。法国认为柏林坚持不了几周,美国政府也是“陷入不确定性与恐惧的瘫痪中”,而发挥主心骨作用的是贝文。David Williamson, “Berlin: The Flash-Point of the Cold War, 1948—1989,” *History Review*, No. 47, 2003, p. 4.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柏林封锁问题在下院的演说》(1948年6月30日),载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史料(二)》,1983年,第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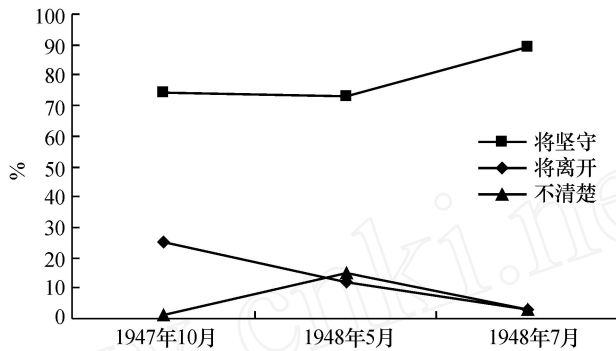


图-2 柏林人对“美国是否坚守柏林”的期望调查(1947—1948) 单位: %

资料来源: W. Phi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A Study in Cold War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44

林封锁结束。这在西方世界看来,无疑是一种合意的结果,因为柏林封锁的结束亦即意味着苏联的进攻行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坚持反封锁斗争取得了胜利。

西方盟友对于柏林封锁解除的合意结果如何进行归因,是盟友间信任类型产生的认知机制。首先,美国将柏林危机的合意结果主要归因于自身的坚定决心与努力。也就是说,美国倾向于把西方盟友对抗苏联的合意结果归因于自己的内在决心与意志,事实上,美国在战后西欧安全问题上确实发挥了主导作用。杜鲁门在评价柏林危机时说:

当我们拒绝被赶出柏林的时候,我们向欧洲人民证明了,当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我们就会在他们的合作下行动起来,而且是坚决地行动起来。从政治上来说,对柏林进行空运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加靠拢我们。

封锁柏林事件是试探我们进行抵抗的能力和决心的一种行动。这一行动和他们过去想夺取希腊和土耳其的企图,都是俄国人刺探在他们周围的西方盟国阵地弱点的计划的一部分。

其次,对于身处封锁之中的当事者即德国来说,这次反封锁的成功主要归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第151页。

功于柏林人民的勇敢和决心。“由于柏林居民决心抵抗和建立空中桥梁,苏联想用饥饿对柏林进行讹诈的企图失败了。”阿登纳在回忆录中也对德国人的优秀品质大加赞扬:

过去在暴力的统治下表现得很英勇的西柏林人在这次也没有软化,而是更顽强,更坚定。在这几个月中,他们令人钦佩地经受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压力……德国和每个热爱自由的人都感谢全体柏林人民,感谢他们的沉着无畏、意志旺盛、坚忍不拔和英勇顽强,感谢他们为整个德国,为自由事业建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从以上各自的解释可以看出,“自我服务”与“自我中心”归因偏差成为西方盟友对于合意结果归因的普遍特征。也就是说,各方都强调自身对于正性或合意结果的重要性。但是,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将合意结果归因于内在属性,但还很少归因于盟友的属性,这是一种“群体自我服务”归因。此外,如果我们将西方世界看作整体的话,不少归因对象均集中于“西方自由世界”对“极权主义”的胜利。贝文于1949年5月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认为苏联的行动对象是针对西方自由世界。如此,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西方盟友之间的信任形成过程:北约缔造国将柏林封锁的合意行为与结果归因于内在属性,因而产生的是情绪性信任。必须指出的是,在柏林危机期间,美国的合意行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属性归因,各方“自我服务”偏差较为普遍。但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的领导与主导作用,还是无须质疑的。这一阶

---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世界大战期间,1914—1950(第四卷:下)》(华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1页。

康纳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版,第196—197页。

这一点在贝文身上也表现很明显。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认为,贝文成为危机当中欧洲利益的代表,因为法国政府遭受挫折,德国尚无政府存在,这明显地突出了英国的作用,而降低了法德的作用。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 584.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p. 685—689.

Avi Shlaim, “Britain, the Berlin Blockade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0, No. 1, 1983/84, p. 1.

段所产生信任是倾向于情绪性信任 (而不是完全是情绪性信任)。

### (三) 信任形成 :朝鲜战争 (1950—1953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延续三年有余,直到1953年7月26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就西方盟友(主要是北约组织成员国)而言,不同国家对于这次战争的态度与行动,成为各自捍卫“自由世界”、实践盟友军事承诺的试金石。下文将考察西欧与美国如何看待和解释相互的行为,以及如何解释这次战争的结果。

尽管朝鲜战场不属于地理意义上北大西洋国家的安全势力范围,但美欧依然十分关注,所以朝鲜战争仍可作为观测北约联盟信任形成的个案。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相比,这场战争呈现不同的特点:战争爆发时西方世界态度同样坚定,但是战争的结果并没有符合西方的意愿;柏林危机发生于美苏对峙的欧洲前沿,而朝鲜战争发生于东北亚。两次事件在时间上相隔较近,由此可以反映出北约联盟信任的连续性与变化。笔者选取考察北约联盟信任如何形成的具体时点有两个,一是分析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的态度与行动,二是战争结束时美欧对战争结果的分析。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不仅来自于对共产主义世界及其“进攻性”行动的恐惧,同时战争的爆发还涉及到美国作为盟友保护者的声誉与威信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影响到盟友对美国的军事承诺与义务的信任,亦即联盟信任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种影响:“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韩国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

---

就如上文德国对柏林危机的合意结果归因来看,阿登纳将柏林危机的成功解除归因为柏林人的勇敢、决心,或者倾向于归因为群体内的内在属性。这似乎偏向于“群体服务”归因偏差。这种归因方式促进了德美之间的团结,但不完全是情绪性信任,其中存有很大的工具性成分。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社会归因为1950年代德美(跨大西洋)之间矛盾迭起、利益纷争不断埋下了伏笔。德美关系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团结和谐,其根源在于冷战对峙高峰时期美欧关系仍未达到完全的内群体认同,所以双方归因解释仍是在“自我服务”偏差与内群体之间。尽管美欧双方对于对方是否承担军事承诺与义务具有安全感,但仍存有疑虑与矛盾之处。Thomas A. Schwartz, “The Berlin Crisis and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 1, 1997, p. 145.

关于朝鲜战争的冲突进展,以及相关各方的具体决策、利益矛盾冲突等的分析,可以参阅沈志华、杨奎松等历史学者运用冷战后一些公开档案的研究。

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事情关系到我们的抵抗决心是否经得住考验,关系到杜鲁门主义中我们所作的准备迎击共产主义对自由国家侵略的声明是否坚定不移。”

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态度是不惜动用武力来支持盟友,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但是,西欧盟友的态度稍微不同。以英国的考虑为典型:其一,美国过度在朝鲜战场投入力量,可能会影响美国对西欧的保护义务与军事承诺;其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升级战略,有可能会刺激苏联在欧洲发动攻势,而西欧处于欧洲军事对抗的前沿。1950年11月,杜鲁门曾表示,美国不惜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这种论调经媒体渲染,在英国引发了政治“地震”。首相艾德礼随即赴美展开协商。尽管存在这种区别,美国的决心与积极行动于西欧盟友来说基本是合意行为。对于美国的合意行为,西欧盟友对此抱持感激之情。6月28日,当哈里曼从欧洲回到美国,坚定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决心与决定,然后以亲身见闻向杜鲁门总统描述,“当欧洲人获知美国岿然不屈时,宽慰之情席卷了欧洲各国的首都”。美国驻汉城大使也发回电报,大加赞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

作为美国最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在朝鲜战争爆发时认为,苏联是战争的幕后操纵者,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战争成功的话,会大大打击“自由世界”的威望和声誉,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制止“侵略行动”。英国支持美国及联合国做出的对朝决议。德国人十分担心苏联的行动,认为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66页。

玛格丽特·杜鲁门:《哈里·杜鲁门》(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01页。

赵学功:《朝鲜战争与英美关系》,《史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48页。英国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欧洲对于朝鲜战争的看法,即一方面需要美国的坚定决心与承诺,另一方面又害怕美国在亚洲战场的“重视”,从而影响到欧洲作为第一承诺的地位。Lawrence S. Kapl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 pp. 150—151。

玛格丽特·杜鲁门:《哈里·杜鲁门》,第207—208页。

赵学功:《英国、美国与朝鲜战争》,第2—3页;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p. 790—802。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努力运用其对美国的影响,防止冲突的扩大和升级,谋求并推动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其原因在于,战后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英美关于对华政策存在较大分歧;英国政府担心战争升级会影响其在东南亚的利益;英联盟国家印度和加拿大一直反对战争扩大化。尽管存在众多分歧和争夺,美国仍认为英国是战后“唯一可以真正信赖的朋友”。具体分析见赵学功:《英国、美国与朝鲜战争》,第31—33页。

朝鲜战争是苏联对德行动的前奏,因为德国与朝鲜极为相似。阿登纳期望西方盟友能加强对德军事义务与承诺,他认为应“由这些占领国发表一项声明,让人家看到为了保卫包括柏林在内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决心和坚定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声明之后,必须继之以看得见的,显示这种保卫决心的迹象。”当然,德国对于战争初期美国在朝鲜的军事不利局面甚为不满。“由于朝鲜事件,他们对美国的实力的信心已经丧失殆尽。”对于这种不合意的结果,德国的归因为情境归因。因为实力并非是美国的内在属性,而是外在情境,换言之,并非美国缺乏意愿,而是实力不够所致。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上任六个月后,艾森豪威尔结束了朝鲜战争。在停战广播中,艾森豪威尔称:“我们仅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而不是世界和平。我们现在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停止我们对和平的追求。”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西方世界是如何解释这种不合意的战争结果的。

艾森豪威尔将朝鲜战争的不合意结果归因于韩国的软弱无能。在关于停战的公开演说中,出于维护整个西方世界团结以及盟友面子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对参与战争的盟友表示了衷心感谢,对韩国更是大加赞扬。但在日记中,他大发牢骚:“要不是因为从韩国撤退会严重影响到日本安全,在那里作战的多数联合国国家早就想撤兵了。”接着,他直言战争的沮丧结果是韩国的内在属性使然:

李承晚完全不善于合作,甚至独行其是……由于李承晚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原因,事态发展中充满着踌躇、犹豫和挫折。因此我怀疑即使达成了停战协议,到底有什么巨大意义。……但是李承晚这位盟友,也实在太不争气了,确实非得严词训斥他一番不可。

---

康纳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第396页。

同上书,第399页。

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徐门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受命变革(1953—1956)》(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23页。

罗伯特·H. 费雷尔:《艾森豪威尔日记》(陈子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329页。

同上书,第329页。



艾森豪威尔对朝鲜战争的归因是一种典型的“负面归因”，将不合意、负面的结果归因为情境因素，而不是自身属性，因为韩国的无能之于美国是一种外在情境，是美国所无法控制的。英国对于朝鲜战争结局总体上持维护美国立场的态度，尽量避免做出任何伤害美国感情的事情。对于美国领导的这场捍卫自由世界声誉之战，英国并无直接利害与利益关系，但还是支持美国的决心（不包括战争扩大化）。英国并没有指责美国的意愿和能力，相反，丘吉尔等领导人认为，在停战谈判期间，英国并没有充分理解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的困难。“他们不仅要对付共产党人的固执态度，而且还要对付李承晚总统为首的韩国政府的态度。……他们两人不得不考虑强大的韩国军队可能会做出的反应，尽管这支军队是他们自己花了大力建立的。温斯顿爵士说，他本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方面所遇困难的程度。”停战协定签订后，英国国务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大力赞扬美国主导的集体抵抗行动，认为联合行动是有成效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并未将朝鲜战争的不合意结果归因为美国的内在属性，而是强调一些客观困难情况等。这种将不合意结果归因为盟友的外在情境，所形成的联盟信任倾向于情绪性信任。但是，英国对朝鲜停战协定当中所取得的各种“进展”，都归功于丘吉尔和艾登减缓东西方紧张的努力。这里体现出英国的“自我服务”及“正面归因”偏差。正如华庆昭所言，朝鲜战争中“美国主要的得分是在盟友面前建立了信任：它不会抛弃朋友。北约组织及其

---

英国对韩国李政权其实是“痛恨不已”，它反对在李维持政权的情况下实施停战协定。但是出于维护与美国合作的大前提下，英国并未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关于北约盟友的归因偏差考察，笔者重点分析的是美国和英国，而并没有考察法德等国。这是因为，由于英美特殊关系的背景，如果英国存在归因偏差，其他盟友则一定存在偏差。所以，英国成为本文考察北约盟友对美国及北约行为及结果归因方式与偏差的“最极端个案”。具体来说，只要英国存在归因偏差，其他盟友则一定也存在归因偏差；而如果其他国家存在归因偏差，我们无法直接得出英国是否存在归因偏差。下文的分析表明，朝鲜战争期间北约尚未完全达到内群体认同。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3年）》（季国兴、刘士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同上书，第272—273页。

Peter Lowe, "The Settlement of the Korean War," in John W. Young,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urchill's Peacetime Administration, 1951—1955*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28. 令人惊讶的是，在朝鲜战争停战期间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通信中，双方并未认真讨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当然，两人出于“亲密朋友”的身份，还是体现出体谅、理解和宽容等心情。Peter G. Boyle, *The Churchill 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 1953—1955*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p. 59—89.

军事司令部得以顺利建成,其他地区性集体安全组织也逐渐建立起来。”

总之,朝鲜战争中大西洋盟友之间的社会认知方式,可以印证北约联盟信任的产生过程:在朝鲜战争期间,北约成员国将合意行为与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如此美欧之间倾向于形成情绪性信任;北约成员国将不合意行为与结果归因为外在情境,如此美欧之间倾向于形成情绪性信任。

### 五、结 论

北约联盟首先是战略性的联盟,同时也是民主国家的安全共同体。在历次危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主义的民主国家认同深刻地影响着北约的战略功能。一般而言,认同性的联盟往往以血缘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单位价值属性的高度相似与认同为基础。

三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是联盟认同/身份形成问题。在前述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北约形成时期(1948—1953年),北约并不是完全的内群体身份。从反事实推理来说,假设北约在上述时期已初步形成完全的内群体身份,我们将观测到北约联盟信任形成的社会归因为内群体归因,即将合意的结果完全归因为内在属性、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于外在情境。根据笔者的简要分析,北约联盟信任形成的社会归因并不完全是内群体归因,北约盟友存在大量其他的归因偏差,诸如自我服务、正面归因等等。如此将北约联盟信任定义为情绪性工具信任或许更为合适。这一判断也与北约联盟组织内部的信任类型以及各方利益争吵的现实相一致。

其次,信任程度与联盟制度化的问题。如果联盟信任程度越高,则这种信任的积极情绪水平越高,盟友之间对于相互信守军事承诺与义务的“安全系数”也就越高。如果联盟信任程度越高,联盟组织的内部制度化建设以及联

---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33页。

本文理论部分对情绪性信任的分析指出了它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安全信念”。

盟组织的内部团结与凝聚力就越强,群体之中“我们”的感觉就越强烈。柏林危机促使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又促进了北约的完善。其具体表现是:1951年4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成立;美国相继增强在欧洲的军事力量;1952年,北约联盟的大西洋盟军司令部和海峡司令部相继成立;2月,北约理事会总部和国际秘书部在巴黎成立。

在这两个案例中,朝鲜战争中形成的联盟信任程度更高。这是我们由制度化建设反观信任程度变化所得出的结论。加强联盟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是否可以增强联盟信任的程度呢?在非对称性联盟关系当中,力量强势的盟友加强制度化建设,有可能会形成“制度霸权”,这将直接导致联盟内部工具性因素的增长,而并不会直接产生情绪性信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朝鲜战争中西欧盟友对苏联的威胁知觉要强烈得多,但反对朝鲜战争升级,担忧升级的后果是欧洲成为苏联的进攻对象。这表明共同威胁知觉的程度非常重要。朝鲜战争中美欧盟友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存在差异,所以欧洲对美国的军事承诺与能力产生了怀疑,担心美国在东亚战场投入过多,影响其在欧洲的军事承诺与义务。

第三,国家同质性与群体身份的关系问题。高度的国家同质性是外群体向内群体演进的重要条件。这一论断产生了两个具体的问题,其一是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的作用,其二是为何同样建立在意识形态一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与北约的历史命运迥然不同?解释这一问题,需要仔细考察这两种同质性的特性差异。里斯—卡朋(Thomas Risse-Kappen)强调自由民主国家所形成的认同的作用;卡赞斯坦等学者的分析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以及美欧之间共有的历史血缘、宗教文化与文明等软性因素对于跨大西洋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意义。这表明我们需进一步深入认识国家同质性的作用及机制。

笔者关于群体身份演进的两个条件,可能会遇到其他的质疑。比如,既然

---

这里或许要考虑一个特例,即非正式联盟的制度形式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表述应为,情绪性信任有助于联盟的制度化建设。这二者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或者说不是充要条件。

Nigel Gould-Davies,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 No. 1, 1999, pp. 90—109.

Thomas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高度的同质性与共有外在威胁是群体身份转变的条件,这两个条件消失后,群体是否会发生变化?甚至联盟走向解体?对此,笔者给出的推测是,联盟是群体组织,群体形成之后会形成群体认同、利益以及群体动力,因此组织利益学说和群体动力学能更好解释联盟身份以及组织形态的变迁问题。

最后,关于理性和认知解释的比较问题。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模式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因此笔者试图综合有限理性变量来发展弱式理性主义解释模式。在解释北约联盟信任的形成时,笔者发现两种解释模式各有所长。理性主义解释的优势在于其变量的易于操作性,以及分析数据的易得性,并能解释和预测联盟信任程度的变化趋势以及信任的非对称性。社会认知解释的优势在于能具体分析信任产生的时点,即盟友之间的社会归因成为关节点。在两种解释模式的预期中,北约联盟信任的形成都倾向于形成情绪性信任。但问题是,理性变量一定能产生情绪吗?换言之,理性与有限理性变量是否是情绪性信任形成的必要/充分条件?比如,在中苏同盟形成过程中,从国家同质性、社会交换程度、不确定性以及威胁知觉四个条件都具备,但中苏同盟只是战略性联盟,是工具性信任。因此,中苏联盟成立后矛盾重重,名存实亡并最终解体。

这些反例表明,理性变量在联盟形成过程中并不必然产生情绪,社会认知中介变量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如果联盟是外群体身份,则理性变量并不能产生情绪。因此,通过对不同社会制度联盟的国家同质性比较,我们可以确立同质性事实上是“认知信念”的观点。具体来说,比较北约与华约联盟国家的同质性,或许发现差别并不是很大;但如果从具体联盟缔约国对于同质性的信念出发,就可以发现同质性信念的巨大差异。这表明,在理性主义与社会认知两种解释模式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是可能、必要且合理的。

---

关于联盟的稳定和变迁,可参见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40 页;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3, 1996, pp. 445—475.

基于此,笔者认为理性变量可以作为情绪产生与形成的基础变量,但认知中介变量是必要条件。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对群体外的成员或外群体运用理性主义的手段,那么很难产生情绪以及情绪性信任,这也说明了群体身份的演进成为情绪产生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而言,同质性与威胁知觉程度对于联盟身份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同质性因素,如何界定与认知是解释群体身份变化的重要环节。

## 作者简介

**聂宏毅** 199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获电子工程学士学位,200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获军事战略学硕士学位。2002至2004年在总参谋部办公厅工作。2008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反制高技术主战兵器招法》(合编,2001年)。

电子邮箱: nhy04@mails.tsinghua.edu.cn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85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分别获技术物理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9年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工作,1999年8月至2000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最新著作为《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2006年)

电子邮箱: libin@mail.tsinghua.edu.cn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研究。

电子邮箱: benyin109@163.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82年在黑龙江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分析》(2008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6年)、《国际政治与中国》(2005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2001年)、《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

电子邮箱: yanxt@mail.tsinghua.edu.cn

**黄宇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生。2006年作为交换生在香港大学学习。

电子信箱: hyx05.tsinghua@gmail.com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3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获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译著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合译,2005年)。

电子信箱: pkusongwei@yahoo.com.cn

**左希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2007年在南开大学获国际政治学士学位。

电子邮箱: zuoxiying@gmail.com